



民国国学文库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孟子

缪天绶 选注
刘艺 校订

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孟子

MENG ZI

缪天绶 选注

刘 艺 校订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 / 缪天绶选注;刘艺校订. — 武汉:崇文书局, 2014. 8

(民国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5403-3437-6

I. ①孟… II. ①缪… ②刘… III. ①儒家 IV. ①B222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394 号

民国国学文库 孟子

出版发行:崇文书局

地 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

印 制:武汉市宏达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145×210 1/32

印 张:4.125

版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3-3437-6

定 价:12.00 元

法律声明: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出版、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,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: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总 序

冯天瑜

作为汉字古典词，“国学”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，以与地方性、基层性的“乡校”“私学”相对应。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，朝廷设“国子监”，又称“国子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。

时至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，与来自西洋的“西学”相比配，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“国学”一名出现。如江户幕府时期（1601—1867）的日本人，自18世纪起，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：汉学（从中国传入）、兰学（从欧美传入，19世纪扩称洋学）、国学（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，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，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“国学”一名，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1902年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撰文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外学”对应，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，梁氏曰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遽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公示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”宗旨。这里的“国学”意为“国粹之学”。该刊发表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、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、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等人的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

文字训诂方面文章，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在“中国固有学术文化”意义上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为“国故之学”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，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，此前清人多有用例，如魏源（1794—1857）认为，学者不应迷恋词章，学问要从“讨朝章、讨国故始”（《圣武记》卷一一），这“讨国故”的学问，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。

经清末民初诸学者（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黄侃、陈寅恪等）阐发和研究，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：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诸子、文学，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、史、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，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，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、彼此促进，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，多以偏师出现，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。

中国学术素有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的传统，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。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，高度分科化，利弊互见。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，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。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，有人主张打通文、史、哲壁垒，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“国学”之创设，并编纂教材，进于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其先导性教材结集，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《学生国学文库》。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。略举大凡：经部如诗、礼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汉、五代，子部如庄、孟、荀、韩，并皆刊入；文辞则上溯汉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诗歌则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均有单本，词则多采五代、两

宋。丛书凡 60 册，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，经史诸书选辑各篇，以表见其书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学技术、历史脉络者为准。其无关宏旨者，概从删削、剔抉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，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，驾轻就熟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这样一套曾在 20 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、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。崇文书局因应时势，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、合并、校勘，以 30 册 300 余万言，易名《民国国学文库》呈献当今学子。诸书均分段落，作标点，繁难字加注音，以便省览。诸书原均有注释，古籍异释纷如，原已采其较长者，现做适当取舍、增删。诸书较为繁难、多音多义之字，均注现代汉语拼音，以便讽诵。诸书卷首，均有选注者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书概要、参考书举要等，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，不厌其详，现一仍其旧。

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，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。

是为序。

校订说明

丛书原名《学生国学文库》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，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《民国国学文库》，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。

原丛书共60种，考虑到难易程度、四部平衡、篇幅等因素，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，现删减为34种30册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。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。

原文部分，均选用通用、权威版本全文校核，参以校订者已见做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。为阅读的通顺、便利，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。

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、文后注，以便读者省览。原注作了适当增删，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，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，增删力求通畅、易懂，避免枝蔓。典实、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，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。

原书为繁体竖排，现转简体横排。简化按通行规则，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，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，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一般都出注说明，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。

生僻、多音字作相应注音，原反切、同音、魏妥玛注音，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。

国学读物校订，工作浩繁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多有不当处，还望读者指正。

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。

绪言

孟子传略

孟子 名轲。鲁公族孟孙之后。今山东省邹县人。司马迁《史记》、班固《汉书》、赵岐《孟子题辞》多未之及。王肃以为字子舆，傅玄以为字子居，王应麟皆疑其傅会。

孟子之家庭 孟母最有名，三迁断机故事，几妇孺皆知。赵岐《孟子题辞》称其夙丧父。陈镐《阙里志》、薛应旂《四书人物考》遂谓孟子三岁丧父。周广业辨之曰：“赵氏《题辞》云：‘孟子生有淑质，夙丧其父，幼被慈母三迁之教。’及注后丧逾前丧云：‘孟子前丧父约，后丧母奢，前后虽无定时；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，相隔必不甚久远。’礼曰：丧从死者祭从生者。祭以三鼎，则丧父在为士之后甚明。其时年盖四十余矣。《题辞》所谓夙丧者，亦以父先母歿耳，非必幼孤也。”王复礼又曰：“若前丧在三岁，则丰啬非所自主，仓安得潜之。盖孟父实未尝卒，其三迁断机，或者父出游，慈母代严父耳。”由周广业、王复礼之言，则孟子三岁丧父之事，颇疑其非实。而孟父在，家庭教育之责任乃委之其母，则父出游之臆测，亦为或然之事实。相传孟父激公宜，孟母仇（zhǎng）氏。《续文献通

考》乃谓孟子娶田氏，生子罍。皆未知所据。

孟子之学术渊源 孟子少（shào）受母教，长（zhǎng）受孔家之纯儒术化。孟子行为哲学中之自反说，为其处世最和平之方法。《韩诗外传》载孟子出妻事：“孟子妻独居，踞。孟子入户，视之。白其母曰：‘妇无礼，请去之。’母曰：‘何也？’曰：‘踞。’母曰：‘何知之？’曰：‘我亲见之。’母曰：‘乃汝无礼也！非妇无礼。《礼》不云乎？将入门，问孰存。将上堂，声必扬。将入户，视必下，不掩人不备也。今汝往燕私之处，入户不有声，令人踞而视之；是汝之无礼，非妇无礼也。’于是孟子自责，不敢去妇。”可见孟母之粹于道德，而孟子异日在行为哲学中所持之自反说，有由来矣。孟子在战国时，为纯正儒家。孟子自言：“乃所愿则学孔子也。”又言：“予未得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盖不啻开明宣言予为儒教徒也。惟孟子为子思之亲炙弟子，抑为再传弟子。司马迁谓受业子思之门人，班固谓子思弟子疑不能定。王懋竑以孔子、子思、孟子之生卒年岁考之，孟子断不能受业子思。即谓子思年六十二者系八十二之误，则孟子亦在童子之时，未能受业子思。然孔门传授分二支派：一为曾子，曾子传之子思，子思传之孟子；一为子夏，子夏传之骀臂子弓，骀臂子弓数传而至荀子。曾子资性刚毅，所谓君子儒也。子夏资性敏慧，有近名之习，所谓小人儒也。观孟子岩岩气象，屡称曾子、子思之刚毅，其进退出处，大都相类，则固其嫡系也。

孟子之时代背景 赵岐《题辞》曰：“周衰之末，战国纵横用兵争强，以相侵夺。当世取士，务先权谋，以为上贤；先王大道，陵迟堕废。异端并起，杨朱、墨翟之言，以干时惑众者非一。孟子闵悼尧、舜、汤、文、周、孔之业，将遂湮微，正途壅底，仁义荒怠，佞伪驰骋，红紫乱朱；于是则慕仲尼，周流忧世。遂以儒道游于诸侯，思济斯民。”此言孟子之学术思想由于时代思潮之反应也。刘向《校战国策书录》曰：“仲尼既没（mò）之后……道德大废，上下失序……晚世益甚，万乘之国七，千乘之国五，敌侔（móu）争权，盖为战国……力攻争强，胜者为右。兵革不休，诈伪并起。当此之时，虽有道德，不得施谋。故孟子、孙卿儒术之士，弃捐于世，而游说权谋之徒，见贵于俗。”此言孟子在当时社会所处之地位也。孟子与人议论，词锋辩利，比于武事，当时以为好胜。后来如王充之《刺孟》、司马光之《疑孟》，皆于孟子有违辞，以为不类孔子。此亦孟子生战国之世、百家争鸣之时，所受时代之影响，有以使然。假使孟子如孔子之温柔和缓，以与诸子百家相角逐，恐不足以唤起一般之注意。孟子自言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”

孟子书

孟子七篇 《孟子》七篇：首《梁惠王》，次《公孙丑》，次《滕文公》，次《离娄》，次《万章》，次《告子》，次《尽心》。司马迁、赵岐皆谓：“孟子所自作。”

惟韩愈谓：“轲之书非自著。”主孟子自作者则曰：“书名《孟子》，是孟轲所自作之书。如《荀子》。”又曰：“读七篇，观其书如镕铸而成，非缀辑所就也。”主非孟子所自作者则又曰：“今考其书，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（shì）。如：齐宣王、梁惠王、梁襄王、滕定公、滕文公、鲁平公是也。夫死，然后有谥。轲所见诸侯，不应皆称谥。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，凡七十七年。轲始见惠王，目之曰叟，必已老矣。决不见平公之卒也。后人追为之明矣。”于是阎若璩（qú）乃曰：“《论语》成于门人之手，故记圣人容貌甚悉。七篇成于己手，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……卒后，书为门人所叙定，故诸侯王皆加谥焉。”

孟子外书 《汉书·艺文志·孟子》十一篇，《风俗通》作书中外十一篇，因谓七篇为中，余四篇为外。赵岐《题辞》则谓：“外书四篇——《性善辨》《文说》《孝经》《为政》，其文不能宏深，不与内篇相似，似非孟子本真，后世依仿而托者也。”是外书在赵岐之时，即已认为伪书，不为学者所重。其后南宋孙奕则自谓闻之前辈，亲见馆阁中有《孟子外书》四篇。刘昌诗则谓新喻谢氏多藏古书，有《性善辨》一帙（zhì）。至明姚士粦又传《孟子外书》四篇。姚本丁杰为之条驳甚详，断为刘贡父妄作。而此历代忽隐忽现之《孟子外书》，焦循乃截然为之断定曰：“外书四篇，赵氏斥为伪托，其亡已久。孙奕所闻，新喻所藏，已难据信。况此（指姚本）又贗之尤者乎！”

孟子之学说概略

孟子承孔子之后，犹庄子承老子之后。孔子、老子发为言说，皆仅有简括具体之论述，孟子、庄子承之，则皆有雄健浑浩之文辞，以发挥其所宗奉之学说。犹释迦之后，而挺生马鸣、龙树以宏演其教义，殊可异也。孟子于儒家之学说，多所推阐，而亦自有发明。综七篇中，晰其学说性质，大要不外六种：一为心性论，二为行为哲学，三为教学方法，四为政治哲学，五为同时学说之批评，六为尚论古人。今为概述之如左：

心性论 孟子道性善，性善为孟子之本体论，亦为孟子之中心学说。其时论性者，言无善无不善者有之，言有善有不善者有之，言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者有之，而孟子独言性善。自是以后，性善说遂为儒家之基本教条，不主性善说者，不免有非儒家正系之疑焉。孟子既认定人性本善，则吾人欲修养道德，完成人格直发挥吾性所固有之善可耳。故其言曰：“人皆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仁也。人皆有所不为，达之于其所为，义也。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也。人能充无穿窬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。”所谓“达”，所谓“充”，皆自“性善”演绎而得者也。然人类卒至有恶，何也？孟子之解释，则谓耳目之感觉作用，易为外物所引，而未尝经过心之反省耳。苟能经过心之反省，常处于主动地位，自不为物所动。孟子称心为大体，耳目为小

体，名此反省作用为思因；极力告人反省，其言曰：“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”“弗思耳！”“弗思甚矣。”其急切如此。

行为哲学 “孝弟（tì）也者，其为仁（通人）之本与！”孝弟实为儒家唯一之人本主义。孟子谓：“仁之实，事亲是也。义之实，从兄是也。”“尧、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”则亦以孝弟为人类道德行为之单位也。孟子定义利为人类行为之反对标准律，一切行为之动机，以义不以利，无许丝毫利己心夹于其间；是即义利分明之说，为孟子行为哲学中之最大特色者也。厥后董仲舒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、张栻“无所为而为之”之说，皆原乎此。孟子又示人以对人对己之态度。不敢言人之不善，不敢为人师，是其对人纯取谦虚态度者也。“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。”人待之以横（hèng）逆，则必自反曰：我必不仁也，我必无礼也，我必不忠。是其对己纯取忏悔态度者也。自反而仁矣，而有礼矣，而忠矣，人待之以横逆如故也，乃曰：是妄人也，与妄人又何难（nàn）焉？则又取不抵抗态度者也。盖其伟大之精神，终日以不若舜为忧，何暇与常人较鸡虫琐屑哉？故能成其伟大之人格。

教学方法 孟子之教育方法，在今日所谓取自动式者是也。其言曰：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”“君子引而不发。”大匠“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”而其理由与功效，又尝申论之曰：“自得之，则居之安。居之安，则

资之深。资之深，则取之左右逢其原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”又曰：“乐则生矣，生则恶可已也，恶可已，则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。”孟子又谓学者品类不一，而教育之方式，不能单纯划一。其自言所以教者有五：曰时化，曰成德，曰达材，曰答问，曰私淑艾。盖亦以发展个性为要者也。此外如“一傅众咻”，则一注意环境之教育方策也。

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，则又示学者以极力与恶劣环境奋斗之教训也。

政治哲学 孟子承儒家之学，生君权异常发达之中国，而高唱“民贵”之学说，可谓异军特起者矣。在今日民权主义发达之世界，不啻(chì)家常茶饭，平淡无奇；然在昔日之中国，不可谓非瑶草琪花，人间鲜(xiǎn)见者也。由其民贵之学说推之，于是建设其最伟大之保民政策。保民政策之实施，首在处理平民之生产经济。其唯一之希望，在使人民无冻馁(něi)之患，使有菽粟如水火；菽粟如水火，而民无有不仁。此则保民政策之极至也。由当时之政治现状与社会状况论之，斯固最良善之政治计划。即以今日眼光评论之，亦一富有价值之政治学说也。孟子又进而打破君主之权威，抬高臣之位置。彼以为君臣之精神关系，非雇佣性质，为合作性质。君与臣同负保民之使命，而同作保民之业务。君苟违此使命，则臣得以诛此异类。盖虐害民众者谓之贼，贼固人人得而诛之。由孟子之言，则君主不能威权无限，长幽繫于保民使命之下，稍一不慎，即有上断头台之危。孟子

直君主眼中之钉也。然自古大哲，常以高论遭世之忌，致以身殉其主义。孟子生战国时，放言无忌，得免于祸，可谓幸矣。及二千余年以后，大为朱元璋所不快，欲逐出于孔氏之列，盖已无可如何矣。

同时学说之批评 战国之时，学说纷歧，其为时代之产物而成危险的主义者，则兵家、法家、纵横家、功利家是也。其为时代思潮之反应，而走极端之主张者，道家、墨家、农家是也。又有敷衍因循以求苟且生息于恶劣之社会为主义者，则乡愿是也。其时知识界人物之情形，大概如此。此各人物所持之主义，皆与儒家发生多少之冲突。而尤在当时知识界中具有重大之势力，其学说尤近道理而尤与儒家有潜隐至深之冲突者，则墨家是也。故孟子大声疾呼，以拒墨为偌大之任务，致谓：“能言拒杨、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”可以见其用力之猛矣。其次如兵家、纵横家、功利家、乡愿等，亦皆以严利之言辞纠正之。盖兵家、纵横家、功利家陷国家于机（wù）隍（niè）不宁之中，而乡愿使社会麻痹不仁、是非不分，皆害虫也。

尚论古人 今日一般批评者类知着重于时代背景之考察，几成批评哲学之当然律，而孟子早已言之。孟子谓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是尚友也。”所谓论世即考察时代背景之谓也。孟子又谓：“禹、稷、颜子易地则皆然。”“曾子、子思易地则皆然。”所谓地，则谓各人之特殊关系也。在考察时代背景以

外，又须注意其特殊之关系，乃臻完备缜密之手续，而批评斯有真确性。孟子列论“伯夷，圣之清者也。伊尹，圣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；孔子，圣之时者也”。盖谓各人有各人之特性，亦各有相当之成功。不能执一而论，主彼奴此。彼谓：“乃所愿则学孔子也。”亦学焉而各求其性之所近耳。尤合今日适应个性之说。

凡上所举，皆仅及其概略，多所缺漏。然孟子学说之要义，麓（cū）尽于是。

孟子之辩证术

孟子实一雄辩家也。其门人公都子尝告之曰：“外人皆称夫子好（hào）辩。”是当时即以辩者目之矣。辩之作用，不外悟他。辩之性质，不外是己而非人。己所是者，谓之“所立”。己所非者，谓之“所破”。能使人悟己之所立是者，谓之“能立”。能使人悟己之所破是者，谓之“能破”。孟子之所立所破，上已言之。其能立能破，约略言之如下：

能立，即论理学所谓建设论证也。孟子书中，多正反并用之论证。孟子建性善说，以为其根本学说，故论证之亦甚力。其论证，纯用归纳法。彼自人类性情之发动上观察，则见人皆有怵惕、惻隐之心，人皆有所不忍，人皆有所不为，人皆有无欲害人之心，人皆有无穿窬（yú）之心；无不知爱其亲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以此“人皆有”“无不知”为其

“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羞恶之心人皆有之，恭敬之心人皆有之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”之证据，而因以确立其性善之说。彼又用归纳类推法论证之。彼自耳目口三官之作用观察之，发现其有“同听”“同美”“同耆”之情状，于以类推心之有“同然”。彼谓心之所同然者为理为义。彼谓理义之悦我心，犹刍豢之悦我口。其所归纳而论证者，果已确乎？且勿置论。然归纳论证为建设论证之中最有力者，而孟子能取以论证其性善之说，故能站定脚步，坚其壁垒，而屹然树立一家之标帜。

能破，即论理学所谓破坏论证也。孟子之破坏论证，尤层出不穷，应变无方。其驳农家之劳动主义也，尝为谈话式之驳论曰：“‘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？’曰：‘然。’‘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？’曰：‘否，许子衣褐。’‘许子冠乎？’曰：‘冠。’曰：‘奚冠？’曰：‘冠素。’曰：‘自织之与？’曰：‘否，以粟易之。’曰：‘许子奚为不自织？’曰：‘害于耕。’曰：‘许子以釜甑（zèng）爨（cuàn），以铁耕乎？’曰：‘然。’‘自为之与？’曰：‘否，以粟易之。’‘以粟易械器者，不为厉陶冶；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岂为厉农夫哉？’”剥蕉抽茧，层层推阐，使之自陷于矛盾，此即破坏论证中最有力之反证法也。破坏论证有二方法，或举其逻辑误谬，或举其实质误谬。苟能举出其实质误谬，则可以与对方以致命之伤；而逻辑误谬，可以不举。孟子则善能指摘其所破之实质误谬。彼其驳许子等价之说